

## 也許問題不在答案，而在問題： 族群傳播研究的啟發

魏玟\*

我大約在 2000 年左右，開始從公共電視的議題，逐步涉入族群傳播研究，包括原住民傳播與客家傳播。這時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族群傳播政策與族群媒體建制的面向，特別是國外的相關政策與媒體案例。

2010 年時，我剛好獲得一個參與蘭嶼達悟族研究計畫的機會，隔年的 2011 年到 2012 年之間，我三度到蘭嶼進行田野研究。這是我第一次把族群傳播與媒體的研究，帶到實際的族群裡面去。

當時原住民電視台已經成立 6 年（客家電視台已經運作了 8 年），於是我到蘭嶼做的研究題目很直覺，就是想要從族人那邊瞭解，他們對成立了 6 年的原民台有什麼看法？他們喜歡看原民台的什麼節目？原民台對他們的族群認同有沒有什麼影響？以及他們覺得原民台對族群和族群文化的意義是什麼？

### 一、「完美」的訪談成果

2011 年冬天第一次到蘭嶼的時候，我訪問了 6 位達悟族人。這個名單基本上來自於當時整個蘭嶼研究計畫的主持人郭良文教授（時任教於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由於他已經耕耘蘭嶼研究多年，我便從他建立的在地人際網絡入手，進行第一階段的訪談。

這些受訪者，在一般質性研究的訪談方法裡稱之為知情者（informant），他們對蘭嶼在地事務熟悉，對族群議題也有一定瞭解。他們都正值中壯年，當中有多數人在臺灣本島受過高等教育，當時在蘭嶼的工作，也大多跟蘭嶼的文史保存、社區營造或公共事務有關。從某個角度來說，請教他們對於原民台這樣的重要族群建制的意見，應該是很恰當的。

---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結果似乎也是如此。在這 6 個訪談中，受訪者一致肯定原民台的設立，以及原民台之於原住民族文化復振的重要性。問及原民台生產的內容，他們也都能舉出一、兩個節目，提供具體的看法。雖然也有少數對原民台的運作提出批評或建議，但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完美」的訪談與訪談資料蒐集。

但是當我回到本島，重新閱讀訪談逐字稿時，卻有一種不安逐漸在心中擴大：他們對於原民台的想法太過正面，也太過一致了。這太不合乎人類社會的複雜與變動本質，我的研究一定是哪裡出了錯。

## 二、研究方法的調整

2011 年 7 月第二度到蘭嶼，我決定先做一個方法上的改變：調整訪談對象。除了部分是在上次的名單中，但因為某些原因延到這次才要進行的受訪者，我刻意通過隨機的方式，尋找「更平凡」的達悟族人，請求他們接受我的訪談。

我做的第二個改變是：訪談問題的調整。我的訪談問題不再以原民台為主軸，而是擴及所有的傳播與閱聽經驗，甚至是一般的生活經驗。我想藉此把訪談的側面拉開，看到更多達悟族人的日常，而不是被原民台的問題鎖住。即便是問到原民台相關的傳播議題，也希望是把他們放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中。

經過這兩個改變，我立刻感覺到認識和感受田野的空間一下子被擴大了。我聽到了很多我之前沒想過的事情。例如，我發現一位兼營民宿的理髮店老闆娘，在她店裡的電視上經常播放著「臺灣本土」連續劇節目。她告訴我一個非常矛盾的閱聽經驗：她一方面習慣收看這類大多講述家族內部鬥爭與親情，劇情拖拖拉拉好幾個月的連續劇，另一方面她又經常在觀看過程中感到不舒服，因為裡面的人「太愛報復來報復去了」。

我突然意識到，達悟族人在現有的傳播媒體架構下，其實跟大部分臺灣人一樣，接收著類似的內容，原民台只是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漢人節目中呈現出來的價值觀與文化，其實還是有很不適應的部分。而這些部分，不但主流傳播媒體不可能關注，甚至連原民台這樣的中央集中式族群媒體，也是無能處理的。事實上，當後來我瞭解更多達悟族的文化內涵，瞭解達悟文化中溫和的底蘊，以及人與人之間盡量保持和善關係、避免衝突的傳統，上述理髮店老闆娘對「報復來報復去」的不適，便可以獲得適當解釋了。

### 三、蘭嶼老人教我的事

這次田野研究我還做了第三個改變。除了必要的訪談互動，我刻意保留多一點「自由」時間，以隨機和漫遊的方式到各個部落去做觀察，甚至是毫無計畫的「邂逅」。<sup>1</sup>

有一天傍晚，我在蘭嶼東側的野銀部落剛完成一場訪談，經過一家座落在野銀主要街道的雜貨店，我站在雜貨店開放式的店門邊，看到店老闆和老闆娘兩人坐在竹椅上，正看著電視機裡的原民台。我本來想，如果他們同意，或許我可以跟他們邊看邊問他們的感受和想法。照理說，這是一個同時使用介入式觀察和訪談方法的好時機，但是我最後沒有這麼做，我只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們「看著」電視。

至今我仍不確定原因是什麼，或許是因為當場特殊的氣氛。當時天色已暗，街上沒有什麼人，因為下午下過陣雨，所以空氣相當悶熱。原民台新聞播報的聲音，從發出螢光的電視機傳出來，迴響在野銀靜謐的街道上。老闆和老闆娘兩人動也不動地面向電視機，從側面看，臉上沒有太多表情，彼此也沒有眼神或言語的交換，我完全看不出來原民台的內容跟兩人（照理將應該是他們的目標閱聽人）之間，有產生什麼實質的互動。

就在原民台晚間新聞播完部落氣象預報之後，他們關上了電視機。大概也感覺到我不是來買東西的，於是只是自顧著收拾，看來已經準備打烊。或許就是這樣的一種沉悶的氛圍，我決定不要打攪他們，只是默默地離開。

隔天午後，豔陽高照，我漫遊在北邊的朗島部落，正好碰到三個吃完中飯午休的年輕達悟工人，跟另外兩個年紀較大的族人，在路邊聊天。我感覺這場人際互動的氣氛很隨性，於是上前搭訕閒聊。

他們對我這樣的人物的目的似乎很熟悉：「臺灣來的，來做研究喔？」其中一個工人問。

「研究什麼？」另外一個接著問。

我有點意外他們的問題這麼直接，就簡單地說，想看看大家怎麼看原民台或是看電視。

「原民台很好啊！」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

---

<sup>1</sup> 當然，我也可以用更長的時間，採取類似人類學式的民族誌方法，不過一方面因為研究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我的研究問題仍是一個偏向社會學而不是人類學的提問，所以還是以短期田野訪談的方式進行。

這次我比較警覺，於是先繞開原民台的話題，反而問他們在做什麼工程，工作的狀況等等，聊了一陣子，工人們說他們要去做事了，陸續離開；另外一位老人也說他要走了。最後剩下一位聊天過程中話比較多的老人，他曾經在本島工作過，現在以偶而帶遊客海釣維生。我看他沒有要離開的意思，於是坐下來跟他繼續閒聊。聊著聊著，話題帶到了台電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問題。

「你知道嗎？其實我覺得，自從核廢料來了之後，這裡變化很大。」他嘆了一口氣，憂心忡忡地說。

「喔，是喔，有哪些變化？」我問。

「像是魚啊。現在看到的岸邊的魚，跟我小時候看到的不一樣，那個背鰭的部分。」他說。

他的話嚇了我一跳。原本我以為他要講的大約是過去常聽見的核廢料帶來的問題，例如輻射對身心的影響，或是台電補償金議題等。

「還有草，靠海那一側的山坡上的草，也跟我小時候看的不一樣。」他接著說。

老人的話，一方面立刻啟動我腦袋中從小訓練有素的自然科學理性思維，隱隱覺得他的觀察，恐怕是經不起科學檢驗的吧？但我同時也想到，這不正就是台電和主流擁核人士對反核廢料的達悟族人的制式反應模式嗎——核廢料很安全，你們想太多。

另一方面，老人的話也同時啟動我另外一半腦袋。看著他認真嚴肅的眼神，我知道這是他真實的感受和認知，也是他真正最關心的事情。這些草魚蟲獸的變化，也許經不起嚴謹的自然科學檢驗，但這絲毫不影響或減損這位達悟老人的誠摯述說的社會有效性。這種現象學式的研究取向與思考態度，在整個前往蘭嶼進行的原民台研究計畫中，我卻從一開始就忘記了這種從另外一種學術典範而來的思維方式，僅僅執著於理所當然的，既有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

或許因為感覺到我對他所說的事情有顯著反應和正面關注，老人後來還主動邀請我到他的家中，讓我跟著他和家人一起看電視，因為他知道我在「研究電視」。那天下午，我跟他們看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視，但看的並不是原民台。

#### 四、暫結語：重新找回研究的方向與提問的方法

2012年5月，我第三度前往蘭嶼。這一次，我既不是沿用過去那些理所當然的問題框架，也不是像第二次那樣，刻意尋找相反方向的操作，而是在重新檢討問題意識的過程中，調整問題定位與研究方法。

在前兩次的田野中，我發現，在達悟族人的心目中，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們關心的事物，除了自身的生存與生活問題，最重要的公共議題，集中在兩方面：首要仍是核廢料問題，其次則是晚近愈來愈顯著的觀光化所引發的各種議題，例如因為從事民宿與觀光活動導致部落樣貌變遷、外來商業活動的影響與文化衝擊、利益分配不均衡引發的內部矛盾等等。

而我從自身專業所在乎的傳播問題，其實並不是不重要，而是不能被囿限在原民台的問題框架中被認識和被研究。如果我按照過往的理所當然的提問方式，很顯然地將造成在特定框架下提問，也在特定框架下被回答的循環。這樣的答案，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無論是學術上或實務上。

所以在第三次的田野中，我訪問了更多樣性身分的受訪者。我問了「平凡人」，也問了「知情人」，但我問的問題不再是「原民台如何如何」，而是從他們最關心的議題出發，並從他們的日常關心的議題框架中，去試著接近其中存在的傳播相關問題（例如，關於核廢料處理與觀光化引起的各種問題，無論是主流媒體或原民台其實都沒有足夠且適當的關注），然後才在最後試著連結上原本我想探討的原住民傳播問題。

我相信許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主題，都可能有這樣的操作盲點，尤其是因為我們賴以提出研究問題方向的理論資源，大多援引或移植自西方社會，而我們的整體社會與文化實務，也長期受到西方社會觀念框架的影響而生成，這很容易形成一種交互循環的合理論證迴圈，從而難以在學術上或實務上有所突破。不過，這樣的框架內的自我迴圈，卻有利於學術本身的生產與再生產，以致於盲點更加牢固，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狀況。

當然，我的專業是傳播研究，其他領域是否有類似問題？如果有，狀況又是如何？我無法立刻全面式地探討。但是，至少就我所接觸的族群與族群傳播相關研究課題而言，這樣的狀況非常明顯。從「族群」這個概念開始，其本身就是一個特定政治、社會、文化與學術脈絡下生成的分析性概念，而我們的政府、學界與主流媒體等都接受，理所當然地並運用了這個概念框架，然後符合這個概念定義的相關人群，進入這個框架而成為「族群」。

然而，「族群」並不等於組成「族群」的那一群人的全部，或真實的他們。從「族群」出發的提問，事實上是研究者先行將「族群」固定了下來，才開始進行的，而如前所述，因為研究對象也是在同一個框架下建立其族群意識和族群身分的，那麼這個提問與回答，就形成了一個相互扣連的論證循環。

就以我的蘭嶼研究為例，無論是達悟族中的菁英分子，或是所謂的一般平凡族人，因為在形成族群認同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是在晚近主流的「族群」框

架下進行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回答我關於原民台的提問時，會口徑一致地以正面肯定來回應。因為即使他們不一定真的那麼喜歡看或常常看原民台，但是一旦有人（而且是代表著主流的、正確的論述的學者）詢問，給予肯定且正面的答案，應該就是一個正確且得體的回答吧。

蘭嶼研究計畫結束之後，我仍時常回想起那一次午後朗島海邊的「邂逅」。蘭嶼老人跟我的對話，其意義的多重複雜，以及對我學術工作的啟發，是如此巨大；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我也還不能完全掌握，而持續思索和咀嚼。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位蘭嶼老人教給我的，遠遠超過了我的研究計畫所需要。而其中最重要的體悟應該是：我們都急著想要知道答案，但或許問題不在答案，而在問題。